

客家学研究丛书

第三辑

Hakka
Studies

西婆罗洲华人公司 史料辑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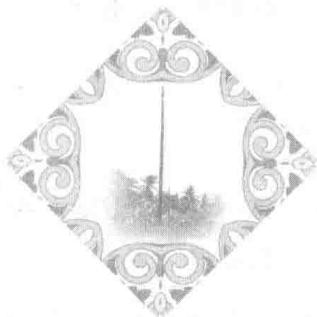
周云水 林 峰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客家学研究丛书

第三辑



西婆罗洲华人公司 史料辑录

周云水 林 峰 编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婆罗洲华人公司史料辑录/周云水, 林峰编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 4

(客家学研究丛书. 第三辑)

ISBN 978 - 7 - 5668 - 2152 - 2

I. ①西… II. ①周…②林… III. ①华人经济—经济史—史料—加里曼丹岛 IV. ①F133.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2230 号

西婆罗洲华人公司史料辑录

XIPOLUOZHOU HUAREN GONGSI SHILIAO JILU

编著者: 周云水 林 峰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李 艺

责任编辑: 李 艺

责任校对: 刘雨婷 李林达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

定 价: 5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西婆羅洲華人公司史料輯錄

長樂宋煥南敬題



本丛书出版得到以下研究机构经费资助：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梅州市客家研究院

广东省客家文化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理论粤军·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客家文化研究基地

广东省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客家学研究丛书·第三辑编委会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丘小宏 刘志伟 何星亮 陈春声
周大鸣 房学嘉 麻国庆 谢重光

主 编：邱国锋

常务副主编：罗嘉文

副主编：罗迎新 肖文评 宋德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冷剑波 罗 鑫 周云水 钟晋兰 夏远鸣

总 序

客家文化以其语言、民俗、音乐、建筑等方面的独特性，尤其是客家人在海内外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贡献，引起了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内学者的关注。而随着西方人文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客家历史与文化研究也逐渐进入科学规范的研究行列，并相继出现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1933年，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标志着客家研究进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的推陈出新，也在呼吁学界能够设立专门的学科并规范客家研究的科学范式。

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专门从事客家研究的机构，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用二十五载的岁月，换来了客家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空前的增长，率先成为客家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若从质的维度来看，当前的客家研究还面临一系列有待思考及解决的问题：客家学研究的主题有哪些？哪些有意义，哪些纯粹是臆测？这些主题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它们是如何通过社会与历史的双重作用，而产生某些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权力的诉求与争议的？当代客家研究如何紧密结合地方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如何与国内外其他学科对话与交流？诸如此类的疑惑，需要从理论探索、田野实践和学科交叉等层面努力，以理论对话和案例实证作为手段，真正实现跨区域和多学科的协同创新。

一、触前沿：客家学研究的理论探索

当前的客家学研究主要分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范围之内，所以开展卓有成效的客家研究自然需要敢于接触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理论。比如，社会学先后出现过福柯的权力理论、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鲍曼的风险社会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卢曼



的系统理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和亚历山大的文化社会学理论。^① 社会科学研究经常需要涉及的热点议题，在客家研究中同样不可回避，比如社会资本、新阶层、互联网、公共领域、情感与身体、时间与空间、社会转型和世界主义。^② 再比如，社会学关于移民研究的推拉理论、人类学对族群研究的认同与边界理论以及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机制，都可以具体应用到客家研究上，并形成理论对话而提升客家研究的高度。在研究方法上，人文社会科学提倡的建模、机制与话语分析、文化与理论自觉等前沿手段，^③ 都可以遵循“拿来主义”的原则为客家研究所用。

可以说，客家研究要上升为独具特色的独立学科，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理论对话和科学研究的范式问题。客家学作为一门融会了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既不是客家史，也不是客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汇编或整合，而是一门以民族学基础理论为基础，又比民族学具有更多独特特征、丰富内容的学科。^④ 不可否认的是，客家研究具有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但要形成自身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若离开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理论的支撑，显然就是痴人说梦。要在这方面取得成绩，则非要长期冷静、刻苦、踏实、认真潜心研究不可。如若神不守舍、心动意摇，就会跑调走板、贻笑大方。在不少人汲汲于功名、切切于利益、念念于职位的当今，专注于客家研究的我们似乎有些另类。不过，不管是学者应有的社会良知与独立人格，还是人文学科秉持的历史责任与独立思考的精神，都激励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触碰前沿理论上不断探索，以积累学科发展所需的坚实理论。

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潜下心来大量阅读国内外学术名著，了解前沿理论的学术进路和迁移运用，使客家研究能够进入国际学术研究对话的行列。

① Demeulenaere P., *Analyt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Mechanis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Turner J. H. ed.,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③ Jaccard J. & Jacoby J.,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Model-building skill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0.

④ 吴泽：《建立客家学刍议》，载吴泽主编：《客家学研究》（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二、接地气：客家研究的田野工作

学科发展需要理论的建设与支撑，更离不开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入和扩展，而进入客家人生活的区域开展田野工作，借助从书斋到田野再回到书斋的螺旋式上升的研究路径，客家研究才能做到“既仰望星空又能接地气”，才能厚积薄发。

人类学推崇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通过田野方法收集经验材料的主体，客观描述所发现的任何事情并分析发现结果。^① 田野工作的目标要界定并收集到自己足以真正控制严格的经验材料，所以需要充分发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手段。从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角度，客家族群的分布和文化多元特征，决定了客家研究对田野调查的依赖性。这就要求研究者深入客家乡村聚落，采用参与观察、个别访谈、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法调查客家民俗节庆、方言、歌谣等，收集有关客家地区民间历史与文化丰富性及多样性的资料。

而在客家文献资料采集方面，田野工作的精神同样适用。一方面，文献资料可以增加研究者对客家文化的理解，而且还可以对研究者的学术敏感和问题意识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田野工作既增加了文献资料的来源，又能提供给研究者重要的历史感和文化体验，也使得文献的解读可以更加符合地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譬如，到图书馆、档案馆等公藏机构及民间广泛收集对客家文化、客家音乐、客家方言等有所记载的正史、地方志、文集、族谱及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田野调查需要入村进户，因此从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客家古村落入手，无疑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客家地区开展田野调查，需要点面结合才能形成质量上乘的多点民族志。20世纪9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劳格文与广东嘉应大学（2000年改名为嘉应学院）、韶关大学（2000年改名为韶关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院、赣南师范学院、赣州市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开展“客家传统社会”的系列研究。他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辗转于粤东、闽西、赣南、粤北等地，深入乡镇村落，从事客家文化的田野调查。到2006年，这些田野调查的成果汇集出版了总计30余册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不仅集中地描述客家地区传统民俗与经济，还具体地描述了传统宗族社会的形成、发展

^①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著，周云水、吴攀龙、陈靖云译：《什么是人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5-67页。



和具体运作及其社会影响。

2013年以来,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选择了多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落,以研究项目的形式开展田野作业,要求研究人员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献追踪等方法,对村落居民的源流、宗族、民间信仰、习俗等民间社会与文化的形成与变迁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形成对乡村聚落历史文化发展与变迁的总体认识。在对客家地区文化进行个案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跨区域、跨族群的文化比较研究,揭示客家文化的区域特征,进而梳理客家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过程。

闽粤赣是客家聚居的核心区域,很多风俗习惯都能够找到相似的元素。就每年的元宵习俗而言,江西赣州宁都有添丁炮、石城有灯彩,而到了广东的兴宁和和平县,这一习俗则演变为“响丁”,花灯也成了寄托客家民众淳朴愿望的符号。所以,要弄清楚相似的客家习俗背后有何不同的行动逻辑,就必须用跨区域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源自田野的事例足以表明田野调查对客家学研究的重要性。

无论是主张客家学学科建设应包括客家历史学、客家方言学、客家家族文化、客家文艺、客家风俗礼仪文化、客家食疗文化、客家宗教文化、华侨文化等,^①还是认为客家学的学科体系要由客家学导论、客家民系学、客家历史学、客家方言学、客家文化人类学、客家民俗学、客家民间文学、客家学研究发展史等八个科目为基础来构建,^②客家研究都无法回避研究对象的固有特征——客家人的迁徙流动而导致的文化离散性,所以在田野调查时更强调追踪研究和村落回访^③。只有夯实田野工作的存量,文献资料的采集才可能溢出其增量的效益。

三、求创新：客家研究的学科交叉

学问的创新本不是一件易事,需要独上高楼,不怕衣带渐宽,耐得孤独寂寞,一往无前地上下求索。客家研究更是如此,研究者需要甘居边缘、乐于淡泊、自守宁静的治学态度——默默地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与两三同好商量旧学、切磋疑义、增益新知。

① 张应斌:《21世纪的客家研究——关于客家学的理论建构》,《嘉应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② 凌双匡:《建立客家学的构想》,《客家大观园》1994年创刊号。

③ 科塔克著,周云水译:《文化人类学——欣赏文化差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7-45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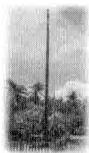
客家研究要创新，就需要综合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音乐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对客家民俗、客家方言、客家音乐等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以学科交叉合作的研究方式，形成对客家族群全面的、客观的总体认识。

客家族群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支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融合多个山区民族的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建立客家学学科，科学地揭示客家族群的个性和特殊性，可以加深和丰富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用客家人独特的历史、民俗、方言、音乐等本土素材，形成客家学体系并进一步建构客家学学科，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从而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客家人遍布海内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家华侨华人1000余万，每年召开一次世界性的客属恳亲大会，在全世界华人中具有重要影响。粤东梅州是全国四大侨乡之一，历史遗存颇多，文化积淀深厚，华侨成为影响客家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建立客家学学科，将进一步拓宽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有助于华侨华人与侨乡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当前客家学研究成果积淀日益丰厚、客家研究日益受到社会各界重视的情况下，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形成客家学学科理论和方法，构建客家学学科体系，成为目前客家学界非常紧迫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敢啃硬骨头，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目前学科建设条件已初步具备的客家文化学、客家语言文字学、客家音乐学等的论证和编纂，初步建构客家学体系的分支学科。具体而言，客家文化学探讨客家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分析客家族群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客家语言文字学探讨客家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的特征，展示客家语言文字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意义。客家音乐学探讨客家山歌、汉剧、舞蹈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揭示客家音乐的具体内容和社会意义。

客家族群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研究时既要注意到汉文化、中华文化的普遍性，又要注意到客家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客家文化多元一体的属性。客家学研究的对象，决定客家学是一门融合历史学、民俗学、方言学、音乐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如何形成跨学科的客家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是客家研究必须突破的重要问题。唯有明确客家学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通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的个案研



究，广泛收集关于客家文化、客家方言、客家音乐等各种资料，从多角度进行学科交叉合作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实现创新和发展。

嘉应学院地处海内外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具有开展客家学研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1989年，嘉应学院的前身嘉应大学率先在全国建立了专门性的校级客家研究机构——客家研究所。2006年4月，以客家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了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梅州市客家研究院。因研究成果突出、社会影响大，2006年11月，客家研究院被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为“广东省客家文化研究基地”；2007年6月，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之后其又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评为“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客家文化研究基地”，被广东省文化厅评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广东省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还经国家民政部门批准，在国家一级学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下成立了“客家学专业委员会”。

2009年8月，在昆明召开的第16届国际人类学大会上，客家研究院成功组织“解读客家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专题研讨会，初步奠定了客家研究国际化的基础。2012年12月，客家研究院召开了“客家文化多样性与客家学理论体系建构国际学术研究会”，基本确立了客家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法。另外，1990年以来，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坚持每年出版两期《客家研究辑刊》（现已出版45期），不仅刊载具有理论对话和新视角的论文，也为未经雕琢的田野报告提供发表和交流的平台。自1994年以来，客家研究院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20余项，出版《客家源流探奥》^①等著作50余部，其中邱国锋等的著作《兴宁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研究》^②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肖文评的专著《白墩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建构》^③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房学嘉的专著《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④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①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② 邱国锋等主编：《兴宁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③ 肖文评：《白墩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建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④ 房学嘉：《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

深厚的研究成果积淀，为客家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已经具备了在国际学术圈交流的能力，这离不开多学科理论对话的实践和田野调查经验的积累。

客家学研究丛书的出版，既是客家研究在前述立足田野与理论对话“俯仰之间”兼顾理论与实践的继续前行，也是嘉应学院客家学研究朝着国际化目标迈出的坚实步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套丛书包括学术研究专著、调研报告、教材、译著、资料整理等，体现了客家学学科建设的不同学术旨趣和理论关怀。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愿意从点滴做起。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引起国内外客家学界对客家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关注，促进客家学研究的科学化发展。

嘉应学院校长兼客家研究院院长 邱国锋教授、博士

于2014年8月30日

自序

对于西婆罗洲的华人公司，国外的研究资料显然要比国内学术界更丰富。至1852年《海国图志》增补之前的中文资料都属记录性的史料，《海国图志》开始有论说性文字，这亦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的开端。在梳理西婆罗洲华人公司史料及其相关研究文献时，我们对那些很难找到原文的、散布在各篇文章中的资料也进行了辑录。如果把《芳翁懿行像赞》和《海录》两份资料确定为18世纪晚期的作品，那么罗芳伯及兰芳公司的研究则几乎与其同时开始，其间差不多有两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在这个过程中，中、荷、英、美、日等国的数代历史学家进行了接力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原因之一是研究者缺乏系统地关注史料或资料完整性的精神，因而编制汇编是有必要的。

华人公司是有自己的史料编辑的，但都在战争中被自己的武装力量或荷方毁掉了。因此现在研究的依据并不是华人公司的一手资料，而主要来源于后人的追述。故而从资料的起源处，就有不可靠和多方杂说的情况发生。其中最明显的是人名说法各异，比如罗芳伯的称呼就有七八个之多。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名家田汝康先生也把“郑宏”误为“郑宏任”了。另外大多数研究者将兰芳公司从西婆罗洲众公司中独立出来研究。高延提到了“福佬人”；罗香林避开了史堪克讨论过的“半山客”，而“半山客”只在袁冰凌的文章中出现过。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仍然没有人认真对待过这些与兰芳公司同时存在的其他华人群体。

问题之一是从历史记录的最初阶段，就已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如吴元盛的史料不完整，如谢清高《海录》只记载了兰芳公司，没有记载其他公司。问题之二是孤证。有些史料只出现过一次，只有一个来源，无法考证是对是错。例如林凤超提出兰芳公司有自己的以“兰芳”为号的纪元，但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的正误。我们只能通过间接的史料猜测，这可能是林凤超编造的，但也没有直接史料证明确无此事。问题之三是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或基于时势的不便等考虑，对史料进行删改，甚或



是造假。如《海国图志》引《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就将罗芳伯称国王一事改掉了。田汝康就曾认为罗香林掌握的史料存在被捏造、删改的问题。辛亥革命前后的史家则把高举“皇清”旗号的兰芳公司整个改造为反清义士的集合。

总的来说，目前对西婆罗洲华人公司历史的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记录西婆罗洲华人历史的资料掌握不全，历史事实还不太清楚。除了罗香林曾经搜集过西婆罗洲华人公司史料，陈达通过实地考察得到一些口碑资料之外，大多数专家受到高延、施好古等 19 世纪 80 年代作家的影响，认为西婆罗洲华人公司资料已然被毁弃殆尽，可能就不再进行最基础的资料搜集工作，特别是忽视了对 19 世纪早期外文资料的钩沉、整理工作。仅凭两百年来中国历代专家的著作，即使是相对详细、清晰的西婆罗洲华人公司编年史也不足以编制出来，更妄论对人物、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开展系统和专门的研究。

其一，对原始资料不重视。表现之一是没有人去挖掘西婆罗洲华人公司历史资料的宝库，仅袁冰凌在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看到过的资料就有一百多份，还只是“公司战争”这一历史阶段的材料，这些资料目前基本还未得到利用。

正是因为对历史事实、历史细节掌握得不够，因而很多人只能以简单的议论来代替叙述，甚至是无依据地议论，人为地制造话题来妄加讨论。这必然导致注重历史事实的文章偏少，评论、阐释型的文章较多，很多人只凭点滴材料进行推演，这显然是盲人摸象式的研究方法。譬如，西方专家都承认华人公司是共和国，国内有些专家却持反对意见，不过两者都认为华人公司是存在民主政治形式的，但这种民主政治的具体流程怎样，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迄今为止，除了说公司领导人是由公司的男性成员选举产生和罢免之外，我们始终看不到一份介绍华人公司的选举类型的实录性材料，比如其选举是使用纸质选票还是数豆子之类的方式。

其二，反映当时事实的史料主要存在于 19 世纪的外文资料中，中文资料从一开始的《海录》《兰芳公司历代年册》（以下简称“年册”）就比较简单，参考性远远不如外文资料。另外，资料集中研究兰芳公司，对和顺公司、三条沟公司关注不够。

很多专家的研究都涉及西婆罗洲华人史，但都不以其为着力点，只有一两篇文章，其中集中了较大精力深入研究的可能只是罗香林一人。因而也只有罗香林的研究才谈得上专著而非专文，田汝康、袁冰凌（有一部英文专著，还没有译成中文）等人的研究成果都只能说是专文，而罗香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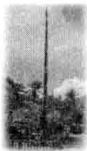
专著也只研究了兰芳公司，对于和顺公司、三条沟公司的探讨几乎没有展开。

其三，对很多历史事实都没有研究清楚。如西婆罗洲华人公司领导下的人口数量，江醒东文中说“随着公司的发展，南来的华侨人数亦逐年有所增加，据估计当时定居在金矿区的达九万人”，这个当时是指公司初创的18世纪70年代，还是指他所说的三大华侨公司并立的1822年，抑或是指西婆罗洲公司最盛的某个阶段，江醒东之文没有说明。如厄尔哪一年到访西婆罗洲，江醒东文中也没有明确说出，看注解就知道，原因在于江醒东的材料是从田汝康文中转引的，田汝康文中没有说，他也就跟着弄不清楚了，江醒东并没有看过厄尔的书。田汝康说目前尚无材料说明最初的华人与西婆罗洲马来酋长立约租让土地采金的情况和条件如何，他也只能以1812年韩特的调查报告来说明19世纪初期的情况，更早的罗芳伯、谢结伯时代的史事从他开始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能说得清，或查得到资料。

其四，对外文资料的翻译工作不重视，没有静下心来翻译外国人的研究成果。如费特（Veth）的著作有一千多页，用荷兰文写成，田汝康利用过费特的资料，此外似乎只有袁冰凌一人懂得荷文，除了这两位之外的其他研究者，都只能从田先生的文章中转用，而不能直接从费特的著作中找到新材料。厄尔《东洋》一文有三章计两万多字的内容记述了他亲眼所见的1834年和顺公司及其他西婆罗洲华人之事，自1837年出版后，一直没有中文译本，田汝康直接看过该书，翌年江醒东文中就只从田汝康文中转引了。1996年袁冰凌从厄尔原版书中引用过，但也只是摘抄了不到数百字的论述而已。

百多年前的外文资料或可解释成因为时间久远，现在很难找到，而得不到利用，但对当代外国专家的研究成果同样重视不够或未去利用，则不合情理。当前，英语教育普及，实际产生的作用却很难在学者中看到，这或许是与国外联系渠道不够畅通所致，一些当代外国专家的论文、专著都未能译成中文，没有被中国学者所利用。如易仲廷文反映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语系国家中有一系列研究西婆罗洲钱币的文章出现，但看中国报刊中竟没有系统研究西婆罗洲华人公司钱币的文章，更谈不上对上述外国专著的利用了。

其五，对源头资料不重视，后出的文章往往从前人的文章中转摘资料。如1959年江醒东文就只有一条材料是自己找到的，其他的外文资料全部从田汝康文中转引。这种情况在外国研究者中也能看到，霍普金斯（James R. Hipkins）的《婆罗洲华人史》关于中国二十五史中的资料都是



引自田汝康或霍尔的书中，这或许是因为他不懂中文。但高延、施好古的资料，他也没有去查两者的原文，只从帕赛尔的《东南亚的中国人》中引用，难道他还不不懂荷兰文？但是同样用英文写的厄尔的《东洋》，都没有从原文中引用任何一条资料，全部抽自田汝康、巴巴拉·沃德、罗香林已经发表过的文章。这种研究态度应当被认为是不严谨的，只能算资料转引之类的成果，在可信度上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在国内学术界，这种不仔细阅读原始资料的态度，越到晚近的学者越为明显，有些甚至犯了低级的学术错误。如2009年发表的《客家人的大伯公》一文所引用的材料，较早的为1943年温雄飞、1961年罗香林、1976年荣抚天、1985年温广益的文章，其他20份资料全是在1992年以后的。如在讨论兰芳公司后期领导人时，引用了1976年荣抚天的论文，但是大段摘录的竟是1914年林凤超的文字，林凤超的《坤甸历史》不难找，该文所引用过的材料在罗香林著作中就有，但很遗憾作者没有去考证。

其六，将一些文艺性质的小说、戏剧材料当作史料来利用。如张永和《罗芳伯传》为传记小说，李强辉的相关论述也属此类，或许张、李二人当初并没有“创造历史”的用意在其中，但经过相互转抄使用之后，往往有人将其中的故事、演义当作真实的历史。在有些人的文章中，罗芳伯考察英国政体、下南洋的路线都成了这种“层层堆积”起来的新史料了。

西婆罗洲华人史研究的中文原始资料就只有《海录》《年册》《坤甸历史》等，更多的资料还在荷文、英文中。不考虑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只论所用资料的完备性和完整性，前代学者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做好，所得结论推测性较强、资料性不够。西婆罗洲华人史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其七，只是一味地引用前人的文章，而不考虑所引用资料的可靠性。如前面所提《客家人的大伯公》引用了赵池凹的关于兰芳公司政制建构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没有出处的。作者引用日本人高木桂藏“兰达克河、曼德尔河流域合计14家公司，合成一家（兰芳）公司”的说法，对照《年册》和罗香林、袁冰凌的说法，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本次汇辑竭尽所能，对罗芳伯和兰芳公司的资料进行了搜集，历时十五年，既搜寻了互联网线上资源，也包括线下的图书馆藏资料，数量达到60多份。

如果我们按时间先后对所有资料进行排列，就可以从中看到研究的继承沿袭情况，从而更加明了资料的引用情况。翻译的资料，尽量找到原著出版的时间，以其为定位列入。实在找不到原著时间的，则按翻译时间列入。另外，我们对各资料进行了初步的考证、辨析、注释。